

## 巴西的土地问题与经济发展

刘婷

**内容提要**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而是否能妥善解决土地问题, 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西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挫折和问题表明: 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 只顾工业, 不顾农业; 忽视土地改革, 甚至在落后的土地制度基础上强行工业化的做法, 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公和经济发展失衡的双重危机。土地问题严重制约了巴西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 给巴西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均衡性。

**关键词** 巴西 土地问题 经济发展 巴西现代化

巴西在历史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 20世纪中期以来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曾与高速发展的东亚“四小龙”齐名, 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体。但是, 巴西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又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至今仍面临着种种发展的难题和困境, 被称为拉美“病态发展”的典型。巴西现代化曲折而又独特的道路令人关注, 吸引着众多学者的探究。本文试图就巴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症结——土地问题, 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问题, 探讨土地问题对巴西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

### 一 巴西土地制度的特点和变革

巴西幅员辽阔, 是拉美的一个农业大国, 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 形成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制。几个世纪以来, 巴西经历了从奴隶制、租佃制到现代雇工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但大地产制一直延续不绝。总的来看, 巴西土地制度及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 (一) 1889年以前的帝国时期: 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制的形成

1532年, 当马丁·阿丰索·索萨在巴西圣文森特建立第一块殖民地时, 对土地的占有就成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之后的几年里, 巴西沿海被分成13个管区, 各管区作为世袭领地分封给封建主, 跟随封建主前来的移民所分得的土地称为份地。由于巴西沿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国际市场的良好销

路, 巴西沿海的肥沃土地很快被划分成巨大的甘蔗种植园, 内地的大片份地上也建立起大牧场。几代人的时间里, 许多原来分配的土地发展成为大地产。18世纪的一位总督指出, 巨大的地产往往使用不当, 只有部分用来耕种, 有些地区需要进口他们完全能够生产的粮食, 这就妨碍了巴西的发展。除甘蔗种植园外, 殖民者又发展了有利可图的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园。种植园经济的发展, 是建立在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直到1888年废除奴隶制后, 奴隶才获得自由。帝国时期的土地制度特点可以归纳为: 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以甘蔗种植园为特色的大地产制的盛行。这种“大地产制不仅是生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

#### (二) 旧共和国时期 (1889~1930): 大地产制的进一步加强

19世纪中期以后, 咖啡种植园逐渐兴起, 逐步代替了甘蔗种植园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从1894年正式开始了代表咖啡利益集团的“保罗人”的统治时期。虽然这一时期自由劳动开始兴起, 但大地产制并未因此改变。在旧共和国时期, 任何一届政府都未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 也未拨出任何土地供他们使用。土地所有制情况依然高度集中, 中小地产在农村中占的比重很小。在1920年的普查中, 只有不到3%的农民拥有地契, 而土地拥有者中10%的人却控制了75%的土地。同中南

收稿日期: 2005-04-14

作者简介: 刘婷, 女, 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巴西] 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 从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 第57页。

部地区相比，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时期，整个国家的土地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强。

### （三）新共和国时期（1930~1964）：土地制度的变革

1930年代表新兴工业中产阶级力量的民众主义领袖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变上台，对巴西南部、东南部各州的土地寡头势力进行严重打击。巴西政权的中心从农村移到了城市，这次革命被称为巴西新旧农村结构的分水岭。面对巴西高度集中的土地状况，瓦加斯及其以后的几届民众主义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措施。1946年宪法第147条提到“促进财产的公平分配，并保障一切人之机会均等”。但是，在1854~1962年的100多年中，巴西历届政府均未制定过完整的土地法律。1947~1962年间，各种政治力量曾提出过45个关于土地改革的提案，但都没有被特权阶层把持的议会通过。若昂·古拉特总统在1962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土改是一项“不能再拖延的任务”。但是，他的激进民族主义改革方案不能为国内外右派势力所接受，最终他的政府被军人政变所推翻。这一时期巴西农村中并存着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庄园、大种植园，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 （四）1964年以来的土地状况

1964年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土地改革方面的努力。1964年起草公布的《土地章程》，是对土地改革起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件。20世纪80年代，巴西恢复文人政府后，土改再次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外国投资的大庄园、大农场数量增多，绝大多数农民缺少耕地，生活状况日趋贫困化。1990年《巴西时报》在总结萨尔内总统的土改成绩时指出，在他执政的5年中，共向717个农场征收土地469.3万公顷，为11.5万户无地农民颁发土地证书，但无论是征收土地的数量、还是安置农民的数量，都只相当于原来计划的10%。到目前为止，巴西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基本过渡到资本主义性质，大部分私有土地由地主自己经营，小部分以分成和租佃方式给他人经营，这三种经营方式分别占巴西地产总数的61.6%、6.3%和12%。

从巴西土地制度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最突出的特点：（1）农村中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贯穿了巴西几百年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土地占有情况带来根本性的转变；（2）与不

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相伴产生的是少数富人生活极度奢侈，广大农民却极度贫困，农村中的贫富分化状况极为严重；（3）大片土地被闲置，土地利用率很低。在此基础上启动的巴西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摆脱不了土地问题的制约。

## 二 土地问题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

20世纪中期以来，巴西经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一次发生在1951年瓦加斯再次上台以后。他加强国家干预作用，对石油等资源实行国有化，加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步伐。从1948~1956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为6.4%，工业产值增长率达8.8%。巴西开始改变原来靠出口初级产品的农业国地位，向工业—农业国迈进。巴西的第二次经济飞跃发生在军政府时期。当时军政府启用了一大批技术经济专家，并在高压统治下全面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巴西的经济在1968~1973年出现了战后以来的第二次飞跃，被誉为“经济奇迹”。在这6年中，巴西GDP年增长率分别为11.2%、10%、8.8%、12%、11.1%和14%，年均增长率达到11%以上。巴西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钢产量从1968年的443万吨增加到1974年的750万吨；汽车产量由27万辆增加到90.5万辆。同时，出现了石油化工、电子、核能、飞机制造、军工生产等现代工业部门，巴西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1970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分别为48%和52%，到1974年重工业比重达52.8%，超过了轻工业。

然而，巴西经济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直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和隐患，最终导致了8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巴西的经济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挫折。1984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30%，外债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同时，失业率猛增，社会极度不稳定。此后，巴西社会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出现发展过程中“失去的10年”。究其原因，巴西经济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内部根源，即社会经济结构上存在的重大比例失衡和各种矛盾。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巴西发生的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的

[巴西] 路易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武汉，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巴西教研室编印，1983年，第119页。

苏振兴著：《巴西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66页。

发展危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周期性危机，也不同于战后多次出现的、受外部经济影响而发生的短暂的经济发展减速。危机发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国内生产的相对过剩引起的，也不是由外部作用引发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是土地问题长期解决不利，造成农业发展长期滞后于工业。而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重视出口作物却轻视粮食生产，这两点则是导致巴西整个社会经济“有增长、没有发展”的直接原因。

巴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利用及生产经营的落后致使农业生产率低下。到20世纪50年代，巴西80%的农业用地未加利用，或是徒然地用于畜牧饲养。土地生产率低使巴西农民食不裹腹，而大地主为出口赢利而占用耕地、生产单一作物、不顾粮食生产的做法，更是把巴西的大量人口推到了饥饿的边缘。按照出口产值来说，巴西的咖啡、甘蔗、大豆等居于前列，但是小麦等粮食作物却长期依赖进口。1978年巴西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而巴西60%的人口却仍处于饥饿状态。1984年的统计表明，巴西64%的人口营养不良。农业生产的滞后，给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1965~1970年期间，农业年增长率也只有0.4%，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原料、资金和市场。由于巴西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的，土地高度集中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农民的贫困使国内物质需求的可能性无法实现，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规模。另外，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落后的情况，使农村中对工业品的吸收能力极为有限。因此，国内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得到相应的扩大，而是很快趋于饱和。

一位学者指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远不像健康的工业化国家那样好似一匹体态匀称的骏马，英姿矫健。这个奇特的动物更像一头长颈鹿，身体各部分不成比例，某一部分过大，极易倾倒，脑袋过沉，使沉重的身躯无法支持”。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业革命，是稳固建立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土地的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同时提高。只有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才可以用来购买工业制成品，工业才能兴旺发展。在巴西，情况正好相反，“工业得到大力发展，却没有足够的农产品来支持这种发展。”这归根结底是由于巴西经济中的工农业结构失衡引起的。

### 三 土地问题与社会的贫富分化

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是巴西长期陷于“病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差距的程度，基尼系数0.5~0.7之间为高度不平等，0.2~0.35之间为较为不平等。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拉美大国同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较为相似，大体都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状况。巴西基尼系数为0.5（1960），中国台湾为0.55（1953），韩国为0.46（1958）。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下降，韩国为0.28（1971），中国台湾为0.27（1971），而巴西却居高不下，为0.57（1970）。由于分配不公，巴西形成了特权消费社会，广大的群众根本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富尔塔多的研究表明，巴西50%的人的总收入相当于1%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在美国，1/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是1/5最贫穷家庭收入的12倍，而在巴西则是33倍。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先增长后分配模式”。按照巴西“经济奇迹”的设计师、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的观点，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比分配更重要。他主张先把经济这张“饼”做大，然后再分配。然而，巴西既没有真正做大经济这张“饼”，大多数国民也没有分得任何好处。土地占有不均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均这个问题，对巴西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利于国内市场的开拓和发展。由于巴西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农村中大量人口缺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用地，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导致社会购买力低下。经济学家指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时，储蓄才能增加，才能提供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保证。然而，少数极富有的人往往会把商品的生产引入歧途。在军政府时期，巴西的奢侈消费

[美] 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

[英] 保罗·哈里森著，钟菲译：《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24页，第225页。

[法] 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著：《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

[美]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3~133页。

品生产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从 1960 年到 1980 年，每千人拥有汽车的数量由 7.6 辆增加到 66 辆。尽管国家不断大量投资生产高档耐用消费品，但由于富有阶层追求同类外国名牌产品的心理，巴西无法降低进口奢侈品的数量，导致国内市场疲软。

第二，大量贫困人口涌入大城市，造成过度城市化、甚至城市衰败化。土地集中加上很多小农经常负债和破产，使农民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在当地又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他们成群结队奔向城市，使巴西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在 1940 年，巴西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69%，而 40 年以后城市人口却占到 60%。巴西的城市化速度之快，超过了发达国家同样的城市化水平所需要的时间。美国城市化水平由 30% 提高到 70% 用了将近 100 年的时间，而巴西仅用了 40 年时间就实现了同一水平的城乡结构的变化。巴西城市数量由 1950 年的 96 个增加到 1980 年的 482 个，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圣保罗州的城市化水平达到 88.64%。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贫困人口，城市无法为他们提供起码的生活保障。在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的小山坡甚至城市的高楼大厦后面，出现了大片的棚户区，人们居住在几乎完全没有供水和下水道设施的简陋房子里。过度城市化造成了犯罪率上升、交通拥挤、贫民窟增加等问题，加大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

第三，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低下。社会贫困人口的增加，使巴西下层劳动者缺少受教育的机会。1970 年巴西 10 岁以上的人口约有 1/3 是文盲，1973 年文盲人口达到 1 350 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导致大量受教育不足的非熟练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形成就业市场中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过剩，而高报酬行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从分配角度而言，这不利于收入的扩散，也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因素。此外，劳动力素质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进程，增加了巴西经济对外国科学技术的依赖性。

#### 四 土地开发利用与发展的巨大地区差异

巴西土地问题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对开发利用土地进行科学的统筹，导致了巴西农村和城市、沿海和内陆的相互脱节，出现东南部发达地区的所谓“对内殖民化”。经济的发展不是整个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发展，而是片面的，带有很强的不平衡性和不合理性，最终造成巴西现代化“整合”发生断裂。

总体而言，巴西东南部和南部地区经济发达，北部地区、尤其是东北部地区经济还相当落后。巴西东南部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中心地带，也是最发达的地区，虽然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 11%，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 44%。同时，拥有全国国民收入的 65%，地区经济占 GDP 的 61%。尤其是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组成的三角地带，更是巴西工业和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圣保罗州是东南部的经济“奇迹”，也是全巴西的“奇迹”，它为国家提供了一半的税收来源，雇用了将近 40% 的巴西工业劳动力，消费全国进口物资的一半，并为出口提供 40% 的物资，而它的面积却不到全国总面积的 3%。在 1960~1970 年经济快速增长的 10 年间，圣保罗市的人口增加了 1 倍，成为仅次于纽约和墨西哥城的西半球第三大城市。

与东南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巴西的北部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 42%，而人口却只有全国总人口的 5%。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还有 10 万印第安人分散居住在北部地区的赤道密林里。几个世纪以来，北部地区人烟稀少，劳动力奇缺，一直未曾被开发。东北部是巴西第二大人口稠密地区，拥有全国人口的 30%，自然条件恶劣，以周期性的干旱闻名于世，是巴西最贫瘠的地方，被称为“旱灾深重的东北部”，也是南美洲最大的贫困地区，地区经济只占巴西 GDP 的 16%，人均收入仅为东南部的 1/3。若苏埃·德卡斯特罗把对巴西东北部落后地区的调查定名为“东北部地区的毁灭”，认为“巴西东北部仍然是危机地区，在那里，饥饿和苦难不仅没有逐步减弱，反而变本加厉”。在这片广阔的地域，不到 4% 的人口却占有大部分土地，而广大农民则一无所有。

巴西各地区明显存在着自然地理和人文经济方面的巨大差别，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巴西”。当东南部城市经济飞快发展时，广大东北部农村的居民却挣扎在贫困和落后之中。（下转第 34 页）

张宝宇：《巴西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 年第 3 期，第 42 页。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49 页。

[美] 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第 113 页。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284 页。

基因大豆的挤压，中国大豆将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非转基因优势。如果转基因大豆在中国广泛种植，一旦出现贸易纷争，孟山都公司就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因此，中国应将非转基因确定为大豆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大豆主产区东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产大豆都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转基因成分，应打东北非转基因大豆这张牌，将东北非转基因大豆推广到国外市场，增加大豆的出口创汇能力。<sup>①</sup>

### (二) 严禁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生产

中国明令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严格执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保住这块非转基因大豆生产的“净土”，这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遗传多样化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转基因标识制度提升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含金量”，增加国内市场对非转基因大豆的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转基因标识制度给消费者以知情权和选择权，这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可以保护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产业的发展。

### (三)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进口转基因大豆

(上接第 31 页)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评论：“巴西与其说是一个不发展国家，不如说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sup>①</sup>

失去生存来源的农民的困境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一位学者曾经指出，土地的再分配是为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社会平等的第一步。由于土地分配不公导致的整个社会分配不公、城乡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整合发生断裂，对巴西现代化发展而言无疑带来了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

## 五 结 语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并且更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土地问题自始至终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重视土地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分配制度的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西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挫折和暴露出的问题表明：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只顾工业，不顾农业；忽视土地改革，甚至在落后的土地制度基础上强行工业化的做法，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危机。巴西土地问题解决不好，会严重制约巴西工业化向纵深发展以及整

进一步完善中国对转基因的管理制度，使之更符合中国国情，综合考虑经营者、加工者、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同时又要适应转基因产品将被世界所接受的大趋势，适当进口转基因大豆，采取来料加工的形式“大进大出”。中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肉类产品具有出口优势，因此，对豆粕饲料需求量较大，城乡居民对大豆和豆油消费量也较大，中国大豆、豆油和豆粕的整体消费水平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而当前中国的大豆产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因此，适当进口转基因大豆是必要的。

(责任编辑 蔡同昌)

###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磊、戴瓯和：《转基因大豆安全性评价与发展趋势》，载《安徽农学通报》，2003年第1期。
2. 陈智文：《美国大豆生产及贸易现状》，载《世界农业》，2005年第1期。
3. 张清：《建设东北优质大豆产业带，提升中国大豆国际竞争力》，载《世界农业》，2005年第2期。

① 刘永祥、张志明：《东北五年内将建成全球最大非转基因大豆产区》，载《消息信使》，2003年第23期，第48页。

个国民经济的进步，给巴西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and 脆弱性。这也正是巴西长期难以摆脱依附性发展、不能走上自主性发展道路的重要根源。

因此，重新认识、研究土地问题——这一“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革的基石”<sup>②</sup>，深入探讨土地问题、农业问题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无疑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 鲁 渝)

### 主要参考文献

1. E. Bradford Burns, *A History of Brazil*, 3rd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Angus Maddi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Brazil and Mexic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巴西] 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从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4. [英]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① [巴西] 哈多克·洛波著：《巴西经济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页。

② [巴西] 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从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40页。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Liu Weiguang)

## Can Latin America Realize the Millennium

### Development Goal of Reducing Poverty

(pp.16 - 21)

Judg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of cutting poverty by half by 2015, Latin America has realized 51% of the task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s differen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reach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nd populations sizes, the urgency of the problem is varied.

For most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progress in reducing poverty is the result of increasing social expenditures, cutting inflation, generating more remittance from abroad, and realizing higher growth rate in the years of 2004 and 2005.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further progress of reducing poverty: low economic growth rat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more poverty in the rural areas and worsening income distribution.

(Su Zhenxing)

## Brazil's land Probl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p.28 - 31)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s in their pursuit of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societies to industrialization.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land ownership. The Brazilian experience shows that neglec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r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agrarian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would further aggravate social inequality and arrest economic development.

(Liu Ting)

## Changes of Brazil's Policy towards Genetically

### Modified Bean and Lessons for China

(pp.32 - 34)

Regard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beans, Brazil is advanced in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t has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he GM bean. However, due to lax law enforcement, farmers in Brazil's southern areas smuggled GM bean seeds from Argentina. Monsanto, the American company that holds the patent of GM bean, tolerated the action first, but charged royalties when the farmers became heavily dependent upon the plantation of GM bean. As the fourth largest bean producer and the largest bean consumer in the world, China should learn the Brazilian lesson by strictly implementing the policies regulating GM bean production.

(Chen Zhiwen)

## Evolution of Mexico's Presidential System

(pp.42 - 48)

Mexico's presidential system has been witnessing repeated changes since it was created in 1917. These changes are particularly noted in choosing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on the one hand and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judiciary on the other. At first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as decided without any set rules; then he was hand-picked by the president; and now he was elected by vo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have evolved from confrontation to dependence and adjustment, where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Supreme Court has also chang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supreme judges have acquired more power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s legal affairs.

(Zhang Wei)